

接受与流变： 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

李伟昉

摘要：在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这是其他众多外来作家难以比拟的，从而构成了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被接受的独特性。社会政治诉求与学术学理探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被接受的方式、价值与意义，也显示出接受者不同的心态。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与影响，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使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对这段文学史进行客观的评述、理性的思考，把握其接受的内在规律，不仅可让我们在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和接受中多一份理性自觉，而且对于文学批评价值的坚守、问题意识和责任感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莎士比亚 跨文化接受 现实主义

作者李伟昉，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开封 475001）。

引言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享有盛誉的西方经典作家，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不少国家都先后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了他的全集，其作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文学”。然而，在近现代中国，对这位西方经典作家的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从“传奇作家”到“精神斗士”再到“争议人物”，再到“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这种一波三折的命运沉浮和转折，构成了近现代中国莎士比亚的接受史。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主要由翻译、演出和评论三个方面构成。就目前情况看，有关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和演出的历史，早有不少学者做过梳理和专论，对1949年后莎士比亚的评论，也不乏学者关注和研究。不过，关于1949年之前莎士比亚的评论尚乏专论，尤其是在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上迄今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也未给予足够的价值评估。究其因，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往往过于将莎士比亚置于“启蒙教化”的语境下进行考察，而对于其独特性与重要性估价不足。事实上，莎士比亚虽不像有些外来作家那样，一经翻译便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实秋莎评研究”（项目编号06BWW005）的重要成果之一。

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但也绝非昙花一现、生命力短暂的作家，他属于那种渐渐产生影响并能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作家。笔者将1949年之前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是最初对莎士比亚的接受期，其中出现了四种莎士比亚的接受视角；二是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命运大转折期。本文将以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中心线索，概略地梳理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接受境遇，探讨其内在成因，并对这段接受史给予客观的评述和理性的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

（一）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莎士比亚接受

据载，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9世纪30年代，并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有关。1838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即派人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以便研究当时西方国家的情况。^①该书记载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外国地理志。其中的第28节谈到英国文学情况时，提到“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等四人，说他们“工诗文，富著述”。^②这里的“沙士比阿”即为莎士比亚。可见，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是随着《四洲志》的问世被偶然引入中国的。但这种引入，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励精图治、振兴华夏的强烈愿望。第一个介绍莎士比亚的中国人则是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他在1877年8月11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在参观英国印刷机器展览会时，看到展出的一些著名作品的刻印本，“在这些印本中最著名者，一为舍克斯毕尔（Shakespeare），为英国二百年前善谱剧者，与希腊人何满（Homer）得齐名”。1879年1月18日，他观看了《哈姆雷特》演出后，在日记中写道：“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③郭嵩焘对莎士比亚的评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莎评”。^④

此后，清末一些著名人物如曾纪泽、严复、梁启超等也都较早地提到过莎士比亚。^⑤1903年，上海达文社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英国索士比亚著的《解外奇谭》，译者未署名。《解外奇谭》并非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是改译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十个故事，其意义在于第一次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介绍给中国读者。190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同一著作的全译本，题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327页。

② 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88页。

③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7—268、743页。

④ 阮珩：《中国最早的莎评》，《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 清末外交官曾纪泽在1879年3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过他在英国观看莎剧《哈姆雷特》的情况：“所演为丹麦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这是中国人最早谈论《哈姆雷特》的情节。（见曾纪泽：《使西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的《进微》中说：“词人狄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见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9—40页）梁启超1902年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简称《吟边燕语》)。时隔17年后的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12期上发表译作《哈孟雷特》,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以完整的戏剧形式,并用白话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

总的来说,莎士比亚从最初被引入后的近90年里,中国对他的接受显得格外迟缓,进展不大。并且,莎士比亚不但没有获得好运,还遭到明显的排斥。晚年的鲁迅就曾指出:“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①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客观地梳理出几种对莎士比亚的接受情况。

1. 莎士比亚是一位传奇作家

这种看法1902年已经出现。这一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开宗明义地说:“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②在他列举的小说类型中有“传奇体小说”,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传奇小说家的代表。从时间上看,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是启发《解外奇谭》和《吟边燕语》的译者翻译莎士比亚故事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解外奇谭》和《吟边燕语》影响了读者对莎士比亚传奇作家身份的认同,因为两者的书名及其中的篇名都明显具有渲染奇异、神怪的倾向。《解外奇谭》的译者在“叙例”中认为,莎士比亚是海外一位擅长构思奇谭故事的作家,不仅编写剧本,而且创作小说,因国人从未读过他的作品,所以他要译介莎士比亚,给中国作家的创作“增一异彩”,提供借鉴。^③林纾在译序中也认为,莎士比亚“立意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是一个深受西方人喜爱的“好言神怪”的传奇作家,他的作品“直抗吾国之杜甫”。^④这种并不准确的译介为莎士比亚罩上了一层神秘、离奇、怪诞的色彩,虽然严复、梁启超等人也介绍莎士比亚是一个在国外广有影响、深受欢迎的大作家,但毕竟太过空泛抽象,远不及《解外奇谭》、《吟边燕语》的具体译介来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

尤其是《吟边燕语》,它让当时不少接受者认为,莎士比亚就是一个传奇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顾燮光看了《吟边燕语》后,在《小说经眼录》中写道:“书凡二十则,记泰西曩时各佚事,如吾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之类。作者莎氏,为英之大诗家,故多瑰奇陆离之谭。译笔复雅驯隽畅,遂觉豁人心目。然则此书殆海外《搜神》,欧西述异之作也夫。”^⑤郭沫若在《我的童年》(1928)里说:“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⑥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也回忆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⑦

2. 莎士比亚是凝聚国家民族力量的精神斗士

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是鲁迅。鲁迅早在1907年完成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

① 鲁迅:《“莎士比亚”》,《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9页。

② 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③ 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第127—128页。

④ 兰姆:《吟边燕语·序言》,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⑤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39页。

⑥ 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4页。

⑦ 钱锺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摩罗诗力说》三篇长文中都提到莎士比亚。其中，他在《科学史教篇》中指出：“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所以，他呼吁“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即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① 强调科学技术是当时举国之共识，但敏锐的鲁迅却又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认为科学并非万能。他把莎士比亚视为文学界的泰斗，并与科学界的巨擘牛顿相提并论，表明他对发展健全人格的重视。鲁迅在此所表达的，在“推崇科学技术的同时，不应偏废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下也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又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的话，称赞莎士比亚等是诗人中的英雄，因为他们的作品“得昭昭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最终能使国家“自振其精神而介绍其伟美于世界”。^② 因此，鲁迅是把莎士比亚作为凝聚国家民族力量的精神斗士来看待的，期盼中国能出现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作家，提升民族的自信心和国际威望。鲁迅接受莎士比亚主要是出于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改造的需要，是借用莎士比亚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与思想主张。不过，该观点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少影响，可谓应者寥寥。

3. 莎士比亚是有争议、遭排斥的作家

“五四”前后，在中国学者中曾有过一场翻译什么作品有益于社会政治变革的争论。这场争论虽不是直接针对莎士比亚的，却对他有所涉及。知非在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中认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例如《哈姆雷特》“绝非人类社会中所可有之事”，除了让人受到“极强的刺激”外，别无他用。^③ 1921年，郑振铎发表文章《盲目的翻译家》，明确表达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基于现实需要的看法，指出当时翻译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有些不经济，因此呼吁翻译家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当下中国的现实，然后再从事翻译。^④ 一年后，他再次强调：“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说（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而古典主义的作品，则恐不能当此任。所以我主张这种作品，如没有介绍时，不妨稍为晚些介绍过来。”^⑤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例如，署名万良浚的读者投书《小说月报》反驳说：“有人谓时至今日，再翻译歌德之《浮士德》、但丁之《神曲》、莎士比亚之《哈孟雷德》未免太不经济，鄙人认为此种论调，亦有不尽然者。盖以上数种文学（作品），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者，正不妨介绍于国人。”^⑥ 然而，《小说月报》编者在给这位读者的复信中却明显支持郑振铎的看法：“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这个编者不是别人，正是署名“雁冰”的茅盾。身为《浮士德》译者的郭沫若，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文中，对郑振铎的观点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凡是文学杰作都有超时代的影响，有永恒的生命，都值得介绍。他说：“为什么说

① 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第35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4—65页。

③ 《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④ 《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

⑤ 《文学旬刊》1922年8月11日第46号。

⑥ 《小说月报》1922年7月10日13卷7号。

到别人要翻译神曲、哈孟雷德、浮士德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并且会盲了什么目呢？”^① 茅盾不甘示弱，又发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一文与郭论辩，指出翻译作品“除主观的强烈爱好心而外”，还要有“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等观念作动机。他说：“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② 显然，茅盾强调以社会的实际需要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指向，注重外国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并非有价值的作品就可译介，“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周作人致“雁冰”的信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认为莎士比亚剧的一二种“似乎也在可译之列”，但译者若放下“现在所做最适合的事业”，“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③

有意思的是，就连留学美国、30年代拟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胡适，这时也曾表现出对莎士比亚的不喜欢甚至贬抑的态度。他在1921年6月3日的日记中，谈论“三百年来——自萧士比亚到萧伯纳——的戏剧的进步”的话题时认为：“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 *Othello* [《奥赛罗》] 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 *Hamlet* [《哈姆莱特》]，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 [哈姆莱特] 真是一个大傻子！”^④

4. 莎士比亚是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

王国维和朱东润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1907年10月，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第159号上发表《莎士比传》（《莎士比亚传》）。^⑤ 该传对莎士比亚的生活经历、每个创作分期的特点及其成因都一一做了详细介绍，且列有莎士比亚的创作年表，每一戏剧后都注明林纾的译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国维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和揭示了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交融的总的创作特色，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立于理想界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博大浩瀚，“愈咀嚼，则其味愈深，愈觉其幽微玄妙”，任何人想“据一己之见以解释其著作”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莎氏与彼主观的诗人不同，其所著作，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所作虽仅三十余篇，然而世界中所有之离合悲欢，恐怖烦恼，以及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王国维高度赞扬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第二之自然”、“第二之造物”。这就在看到莎士比亚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时，又明确确立、突显了莎士比亚创作不同于“主观的诗人”的鲜明的现实主义特性，而这是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现实主义。王国维在当时能如此较为全面、精辟地阐释莎士比亚，可见其睿智和敏锐。这篇《莎士比传》，名为“传”，实则评，这是笔者所看到的最早的中国人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莎士比亚评论。

朱东润连续发表在《太平洋》杂志1917年第1卷第5号、第6号、第8号和1918年第9号

①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7月27日，第1—2版。

② 《文学旬刊》1922年8月1日第45期。

③ 《小说月报》1921年2月10日，第12卷第2号。

④ 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⑤ 王国维：《莎士比传》，《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2—397页。

上的4篇《莎氏乐府谈》，是现在所能看到的篇幅最长、最早独立成文的完整的莎士比亚评论。综观这篇洋洋两万余言的长篇论文，至少有两大方面值得关注。第一，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和艺术成就：“莎氏乐府为世所艳称久矣，非特英人崇视莎士比亚，恍如天神；即若法若德诸国人士，莫不倾倒于其文名之下，以为非国人所能及。”莎士比亚戏剧在人物塑造方面，“人人具一面目，三十五种剧本之中，即不啻有几百几十人之小照。在其行墨之间，而此几百几十人者，又无一重复，无一模糊，斯真可谓大观也已”。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艺术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其“言词变化入神，文笔亦如天来游龙，夭矫屈伸，诚文学之大观。读莎氏原文者，于此不可不留意也”。第二，从比较文学视野自觉地将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加以比较认识。例如，他认为李白和莎士比亚“皆天才磅礴，此其所同也”；其不同之处乃在于“李氏诗歌全为自己写照，莎氏剧本则为剧中人物写照”。他还将《铸情记》（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孔雀东南飞》相互映照，认为“果以文境论之，则吾读《凯撒传》时，恍惚如读史公诸传；至于铸情记者，乃如读《孔雀东南飞》之篇。觉其文境绵邈幽咽，不得不为焦仲卿夫妇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放声一叹也”。^①

王国维的《莎士比传》和朱东润的《莎氏乐府谈》在中国近现代莎士比亚接受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中国学界从学术学理层面接受和探讨莎士比亚的开始。

（二）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莎士比亚接受

20世纪30年代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命运的一次大转折。其标志是，翻译、评论莎士比亚渐次形成一个引人瞩目的热潮。不少翻译者如顾仲彝、曹未风、梁实秋、朱生豪、曹禺、孙大雨、杨晦都加入到译莎的队伍中来，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在短短十几年中都被翻译进来。其中，梁实秋翻译出版莎剧8部，曹未风翻译出版11部，朱生豪翻译出版27部。莎评文章明显增多，有学者统计，这个时期发表的莎评文章约有130篇左右。其中，仅梁实秋一人就发表莎评文章20余篇，是这个时期国内撰写莎评文章最多的学者。莎士比亚还是这个时期中国文艺期刊上辟有个人专号最多的西方作家。^②凡此种种，均与前期莎士比亚的接受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莎士比亚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已成共识，他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开始得到普遍重视和积极发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期一些对莎士比亚颇有微词的学者和作家也开始认同并大力推介莎士比亚，例如郑振铎、胡适和茅盾等。郑振铎对莎士比亚态度的转变比茅盾、胡适稍早一些。他在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大纲》中就开始认为：“莎士比亚是所有伊丽莎白时代作家中的最伟大者，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作家之一。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较之中国的伟大诗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尤为重要，而且影响更大。他所遗留于世界文库里的宝藏是任何作家所不能企及的。”^③在谈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时，他认为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人物极为复杂，有的是日常遇到的人，有的是历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人间的英雄，有的是超人间的神仙。而他写来都各栩栩欲活，各个时代的生活，各种社会的里面，也都极真切的表现于读者之前。很少作家写作的范围有他这样广漠而且复杂。他的作品里所具有的是最飘逸的幻想，最静美的仙境，最广阔的滑稽，最深入的机警，最深挚的怜悯心，最强烈的热情，以及最真切

① 参见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7页。

②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③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2卷，《郑振铎全集》第1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的哲学”，^①“他的超绝的艺术手腕诚然是无有可与并肩的！”^②他说《哈姆雷特》“是世界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它“感动了无量数读者的心，使之凄然欲泣”。^③这些看法与他1921年所持有的翻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有些不经济”的观点已有所不同。

1930年，胡适就任由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后，也改变了以往对莎士比亚不屑一顾的偏激看法。根据之一就是他把莎士比亚戏剧翻译赫然列入其庞大的翻译计划，并在1931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及与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人讨论莎士比亚的翻译事宜。梁实秋公开过胡适写给他的谈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几封信，说明胡适对这一工作的积极倡导与热心扶持。其中一信说：“实秋兄：两信都收到了。编译事，我现已正式任事了。公超的单子已大致拟就，因须补注版本，故尚未交来。顷与Richards谈过，在上海时也与志摩谈过，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公超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此意请与一多一商。最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报酬的事当用最高报酬。此项书销路当不坏，也许还可以将来的版权保留。”^④可见胡适考虑之周到细致，用心良苦。梁实秋后来不无感慨地说：“若没有胡先生的热心倡导，我根本不会走上翻译莎翁的路。胡先生自己对于莎士比亚并无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知道翻译莎翁之重要，并且他肯负责的细心的考虑这一个问题。”^⑤他还说：“幸而胡适之先生提议翻译莎氏全集，使我有翻译的方向。”^⑥显然，从实际效果看，胡适较前期对莎士比亚不仅有了态度上的变化，而且以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译介。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在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茅盾早期对莎士比亚也并不感兴趣。1921年12月，他在《新文学》上发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一文，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迎合贵族的趣味”、“得着女士的喜欢”、本身并没有多少深刻、内在思想的媚俗作家，他不过是“贵族阶级的玩好”罢了。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的文学”，“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是向前的猛求真理的文学”，而莎士比亚不能发挥文学作为“社会的工具”的作用。^⑦但到30年代，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却有了根本性改变，其证据主要见于《西洋文学通论》、《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等论著中。茅盾这个时期将莎士比亚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所以积极倡导对莎士比亚的传播与研究，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成为他接受莎士比亚最引人注目之处。1934年，茅盾以“味茗”为署名发表在8月20日《文史》第1卷第3号上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成段转述苏联专家狄纳莫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莎士比亚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莎士比亚的基础是周围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来的世界”。茅盾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第一次借

①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2卷，《郑振铎全集》第11卷，第209页。

②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2卷，《郑振铎全集》第11卷，第215页。

③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2卷，《郑振铎全集》第11卷，第212—213页。

④ 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梁实秋主编：《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年，第562页。

⑤ 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梁实秋主编：《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第567页。

⑥ 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梁实秋文集》第5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537页。

⑦ 茅盾：《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茅盾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50—452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为当时和后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定下了基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他说：“所谓苏维埃作家的‘莎士比亚化’，就是要能够找出活的真实的意象，以表现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和运动。”“就是要升到现代思想的顶点，彻底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文化，以及马克司（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斯大林）的学说，然后思想不会枯竭，然后作品的内容将同时既清楚而又繁复，就像活的语言那样同时明快而又繁复。”“就是做自己阶级的勇烈的战士，以艺术为武器。”“就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著，创造著，工作著，挣扎著。”“就是找寻新的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抛弃那‘炫奇斗巧’的空虚的装饰主义，创造出思想与形式两俱完善的艺术品。”^①其实，“莎士比亚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现实主义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茅盾当时将“莎士比亚化”趋同于现实主义化的接受倾向，充分表现了他对来自红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声音的坚信。

1939年10月，茅盾在《文艺月刊》第2卷第2期发表《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一文，更为明显地遵循着苏联莎评家“从今日的现实的各大课题及明日的目的”的思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意义。第一，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愚昧、残暴、偏见、虚伪、嫉妒、奸诈“从来抱冷淡的旁观者的态度”，他所表现出来的“为求真理的胜利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正是各时代的求进步的人们所亲切而宝爱的德行”。他塑造的不朽人物“唤起了对于更光明的未来的要求，他们主张着个性的更充分自由的发展。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虽然是三世纪前的人生写照，但至今仍保有活力而且为我们所爱好的原因了”。第二，他用“深刻的观察和犀利的笔尖，剥落了他那时代的一切虚伪者的面具”，而“剥落这一切的面具，还是现代的文艺战士的任务，这又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对于我们是亲切的原因了”。第三，“在今日，法西斯的群魔比起莎士比亚所写的那些‘恶棍’，更其野蛮，更其没有人性。现在也是一个‘黑暗时代’，一切的虚伪，残暴，愚昧，偏见，在到处横行，然而同时，莎士比亚‘理想’的那些为了光明而斗争的英雄们，在今日已是现实的人，而且在世界各处，这斗争的火花已经预示着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在今日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七十五周年的生平，学习莎士比亚以加强我们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斗争的力量，是我们的主要课题。”^②在此，茅盾把莎士比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尤其是表明，在莎士比亚375周年时纪念他，就是为了“学习莎士比亚以加强我们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斗争的力量”，让人们“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充满信心。

与茅盾相比，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呈现出另一种状态，可将之看成是对王国维和朱东润等学者学术性接受理路的接续。从1932年至1939年，他发表莎评文章20余篇，让日趋社会政治色彩化的莎士比亚阐释展现出一幅别样的面目，梁实秋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从学术层面一以贯之地研究莎士比亚的个性独具的莎评专家。

梁实秋首先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并历久不衰，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③他的重要作品“没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莎士比亚把握住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为‘不是某一时代的，而是为一切时代的’”。^④由此，他坚决反对把莎士比亚归属到某一个阶级里面的狭隘做法。在他看来：“把一个作家硬派到某一阶级，从而断定

① 茅盾：《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茅盾全集》第33卷，第316—318页。

② 茅盾：《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茅盾全集》第33卷，第469—471页。

③ 梁实秋：《莎士比亚之伟大》，《梁实秋文集》第8卷，第660页。

④ 梁实秋：《〈李尔王〉辩》，《梁实秋文集》第1卷，第694页。

其为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从而断定其作品必系忠于某一阶级，更从而断定其任务必为拥护某一阶级并且反对与某一阶级对抗之阶级，其实是很牵强的。”^① 因为一篇作品当中，究竟哪一段是作者自己的意见，哪一段是描写别人的，很不容易判断。特别“像戏剧小说之类，内中便颇多客观的描写，我们万万不可断章取义，硬派定某一句某一段是作者的自白”。他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特殊处即是：在作品中他很少鲜明的流露他个人的意见……莎士比亚是给社会人生竖起了一面镜子，他不是主观的、抒情的、自我中心的诗人。”^② 他辩证地看到：“莎士比亚作品中之讽刺的成分是有的，他的讽刺是向人性的缺陷及社会的不公道而发，这其间并无阶级的限制。任何伟大作家，对于人间疾苦都不能没有深厚的同情，然而他们的胸襟是廓大的，他们的同情是超阶级的。”^③ “任何阶级都有他的弱点，那弱点便都是可以成为文学家的讽刺的对象的。”^④ 梁实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本真性，反对基于实用的考虑将文学作为工具来使用，尤其反对把文学仅仅变为表现阶级性、政治性的工具。他指出：“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我们可以利用戏剧而从事社会教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借用性质，借用就是借用，不是本来用途。”^⑤ 这一与众不同的见解，使他处在与当时许多人对立的位置，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其次，梁实秋不是理性至上主义者，更非感情至上主义者，他不极端，他追求的终极境界是情与理的和谐状态。他没有把莎士比亚简单地框定在古典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流派里作狭隘的理解，而是从和谐、中庸的理念出发来感知、评论，认为莎士比亚艺术地表现了情与理两者不可偏废的共融一体的深刻的辩证思想。梁实秋说，“莎氏的思想是走的一个中间路线，一个实际可行的路线，很稳当”，他的戏剧所描写的“合于中庸”。^⑥ 梁实秋的莎评在一个以个性自由为标志、以反传统破秩序为使命的特定语境里求常态、求和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恰恰形成了他接受莎士比亚的个性特征。现在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梁实秋所持有的是以理制情的情理观。其实，梁实秋虽然给予理性以更重要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突出理性至上的地位，而是为了使其起到制衡的作用，以便达到情理和谐的自然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新古典主义者偏重理性敌视情感是不对的；卢梭推崇情感排斥理性，是同样的不对。”^⑦

再次，梁实秋基于学术立场的莎评常旁征博引、左右逢源，显示了对西方莎学如数家珍的博大视野。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能从学术史研究角度，审视和梳理西方莎士比亚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翔实地介绍莎士比亚创作的方方面面，让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为新鲜，也较全面地认识了莎士比亚的魅力以及西方莎学的发展概况，大大开阔了读者的阅读与认知视野。如他对海涅关于《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著名观点的介绍，对西方学界著名的“哈姆雷特问题”的引入等都是如此。大陆有意识地译介西方的莎评成果，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事。杨周翰主编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卷则是在1979年和1981年才先后出版的。

这一时期，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在莎士比亚关于“人性”描写方面的某些见解与梁实秋也不谋而合。朱生豪在为其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写的《译者自序》及第一、二、三辑提要

① 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梁实秋文集》第8卷，第642页。

② 梁实秋：《作品与自传》，《梁实秋文集》第8卷，第615—616页。

③ 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梁实秋文集》第8卷，第644—645页。

④ 梁实秋：《莎士比亚与劳动阶级》，《梁实秋文集》第8卷，第648页。

⑤ 梁实秋：《文艺与道德》，《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141页。

⑥ 梁实秋：《莎士比亚的思想》，《梁实秋文集》第1卷，第665页。

⑦ 梁实秋：《浪漫主义的批评》，《梁实秋文集》第1卷，第277页。

中，不仅从世界文学史角度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伟大成就及其重要地位，而且明确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远在荷马、但丁和歌德之上，乃是因为他“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尤其是他的悲剧“直抉人性的幽微，探照出人生多方面的形象，开拓了一个自希腊悲剧以来所未有的境界”，“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① 这一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同样是基于文学内在的审美原则来探究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的。

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说过，接受中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作品的“声誉”问题，它是“衡量作品受欢迎程度的尺码”。^② 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在这个时期所受的欢迎程度已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标志着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真正崛起。

二、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价值取向

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可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倾向，即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接受。前者包括梁启超、鲁迅、郑振铎、茅盾等人，其中，茅盾最具代表性；后者包括王国维、朱东润、梁实秋等，以梁实秋最为突出。但从实际接受的情况看，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莎士比亚接受倾向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莎士比亚命运的每次变化，可以说都是这种社会政治诉求左右的结果。

被誉为中国 20 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主将和文学界革命首倡者的梁启超，一生以文学新民、救亡图存为使命，“企望在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前提下，推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中，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之化”。^③ 他之所以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推重莎士比亚，正是因为莎士比亚契合了他一贯的精神追求和政治使命感。他敏锐地感到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发挥“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的作用，可以激励国民的政治思想和爱国精神。^④ 他感兴趣的不是莎士比亚的传奇作家身份，而是借对莎士比亚的解读抒发其文学新民、救亡图存的政治情怀。林纾翻译《吟边燕语》，也有其现实政治动机的一面。他在译序中认为：“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照此推理，文明的西方人应将“思想之旧，神怪之托”的莎士比亚“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然而他们对莎士比亚“坦然不以为病也”。相反，“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可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袂而听，歔歔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他感叹道，“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记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⑤ 言外之意就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崇尚莎士比亚而与先进、发达无缘。既然西方人都这样喜欢莎士比亚，我们有什么理由拒斥他呢？这里隐含了国家发展无须丢弃传统的道理，显示了林纾维护传统的立场。他借助莎士比亚，显然是要表达对当时一些维新之士只言维新而鄙薄自身传统的不满。仅此一点，当然无可厚非，但引人深思。

① 孟宪强编：《中国莎士比亚评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2—106页。

②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③ 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2页。

④ 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63页。

⑤ 兰姆：《吟边燕语·序言》，第1页。

莎士比亚被边缘化、遭到排斥同样与政治功利性有关。众所周知，后来顽固守旧的林纾遭到了众多五四新文学家的批判，他译介的莎士比亚自然也跟着倒了霉。这除了因为林纾采用的是胡适所说的“半死的文字”文言文译介外来文学外，更重要的是其翻译倾向及其所秉承的译介理念与五四时期所追求的文学理念格格不入。例如，他把《威尼斯商人》译为《肉券》、《哈姆雷特》译为《鬼诏》等，“表面看这不过是标题的变化，细看却带有中国旧式小说（如鸳鸯蝴蝶小说及谴责小说）的痕迹，是取悦市民心理、供其消闲的旧文学观的延伸，把外国文学作为娱乐品对待”。^① 发挥文学救世功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也可以看作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特征。而林纾秉承的文学译介理念被斥为消遣与怡情，不能发挥文学改造社会政治的功用。我们从林纾等人的翻译由最初的受欢迎到后来遭批判的经历，不难感受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在价值理念、道德理想、现实需要等方面的变化。因此，在破旧立新、反对传统、张扬文学革命思想的环境下，莎士比亚以古代传奇作家身份，被林纾等人错位译介，自然也就成了远离现实需要、渲染神怪刺激、旨在消遣娱乐的旧文学传统的代表，被后来不少人所轻看。

胡适贬抑莎士比亚，我们也可从他 1921 年 6 月 3 日的日记中的两处话中找到原因。第一处是：“戏剧所以进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十九世纪中欧文学受了写实主义的洗礼。到了今日，虽有神秘的象征戏如梅特林（Meterlinck）的名剧，也不能不带写实主义的色彩，也不能不用写实主义做底子。现在的妄人以为写实主义已成过去，以为今日的新文学应谈‘新浪漫主义’了！这种懒人真不可救药！”^② 第二处是：“卓克说，易卜生的《娜拉》一剧颇不近人情，太头脑简单了。此说有理，但天下古今多少社会改革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做革命家。娜拉因为头脑简单，故能决然跑了。”所以，胡适虽然以为“易卜生的《娜拉》，以戏本论，缺点甚多，远不如《国民之敌》、《海妲》等戏”，^③ 但还是从社会改革的角度肯定《娜拉》的价值，因为它是写实主义的。这两处表明，胡适不以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故否定莎士比亚。

20 世纪 30 年代，莎士比亚在中国开始受到重视，更与鲜明的政治功利性有密切关系。促成其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莎评传入中国。中国学人通过对马克思莎评的翻译和对苏联莎评的译介，知道了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态度。例如，梁实秋根据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一节翻译的《莎士比亚论金钱》（1934），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马克思是很崇拜莎士比亚的”。^④ 接着，茅盾也发表文章《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译文》杂志从 1934 年至 1936 年也发表 6 篇莎评译文，其中 4 篇为苏联著名莎学专家的文章，均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内容，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现实意义。第二，译介莎士比亚“被提到关系国家荣辱的高度，成为民族能力的标志”。^⑤ 戏剧家余上沅从报载获悉日本文学家坪内逍遥译毕莎士比亚全集的消息后，在《翻译莎士比亚》中感喟说“这件努力是极可钦佩，极可叫我们中国人惭愧的”，因之“切望国内有心人一致主张，促进翻译莎士比亚的实现”，并且希望“中国新诗的成功，新戏剧成功，新文学成功，大可拿翻译莎士比亚做一个起点”。^⑥ 朱生豪也把翻译莎士比亚看作是强烈的民族自尊

①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第 31 页。

② 胡适：《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283 页。

③ 胡适：《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282 页。

④ 《文学》1934 年 5 月第 1 卷第 2 期。

⑤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第 94 页。

⑥ 《新月》1931 年 4 月 10 日 3 卷 5、6 号合刊。

心紧密相关的事业。1936年他曾写信给宋清如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①因此，1944年他在为自己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所写《译者自序》中说：“莎士比亚为世界的诗人，固非一国所可独占；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②可见，从政治信念与政治功用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倾向决定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选择与态度；而现实需要与民族自尊心又促使一些民族精英痛感，翻不翻译莎士比亚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是否愿意接受和喜欢外来作家的问題，而是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是否愿意与日本相抗衡、显示民族自信心和精神能力的政治问题。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遂引发了这个时期翻译、评论莎士比亚的一次热潮，莎士比亚成为毫无争议的极具价值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

茅盾的莎士比亚评论，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接受的偏重。如果再细细考察，我们发现，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认识除了现实主义层面外还有两个视角。一是浪漫主义的视角。他在《西洋文学通论》中指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他是超时代的！”^③不过，他并没有对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先锋的莎士比亚的创作特征作深一步的具体阐释，而是强调莎士比亚为笔下的“历史人物都安上一颗现代的心”，所以如《哈姆雷特》“到现在还是有生气”。^④我们从他的表述里分明既感受到他对莎士比亚浪漫主义气质的自觉意识，又察觉出他对这一气质的某种倾向性的遮蔽。由此推断，茅盾真正看重莎士比亚的并不是他“‘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的特征，而是这个浪漫主义作家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倾向性。二是人性的视角。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中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人性的一种典型的描写。他永久厌倦这世界，但又永久恋着不舍得死；他以个人为本位，但是他对自己也是怀疑的；他永久想履行应尽的本分，却又永久没有勇气，于是又在永久的自己谴责”。^⑤在茅盾看来，作为“伟大的天才”的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超时代的，与其对人性的典型描写和深刻揭示密不可分。这是茅盾首次从人性角度谈论莎士比亚及其著名悲剧形象哈姆雷特，虽然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1935年，茅盾在《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一文里又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不朽的盛名，“皮相者每夸其诗句之美妙，及戏曲的技术之高妙，而其实则因他广泛地而且深刻地研究了这社会转型期的人的性格：嫉妒，名誉心，似是而非的信仰，忧悒性的优柔寡断，傲慢，不同年龄的恋爱，一切都描写了。他的作品里有各种的生活，各色的人等，其丰富复杂是罕见的”。^⑥如果说茅盾在前一文中没有对人性作具体解释，而在这里就涉及了莎士比亚描写人性的一些基本内容，例如“嫉妒”、“名誉心”、“优柔寡断”、“傲慢”等。他在《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中进一步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暴露和抨击了“虚伪，偏见，嫉妒，迷信，残酷等人性的污点”，对于“创造优善健康的新人性”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也是人们对其“起了莫大的爱好与热心”的重要原因，由此“才真正估定了莎士比亚的价值，把他的伟大和优点发扬了出来”。^⑦

① 吴洁敏等：《朱生豪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② 孟宪强编：《中国莎士比亚评论》，第103—104页。

③ 茅盾：《西洋文学通论》，《茅盾全集》第29卷，第254—255页。

④ 茅盾：《西洋文学通论》，《茅盾全集》第29卷，第255页。

⑤ 茅盾：《西洋文学通论》，《茅盾全集》第29卷，第255页。

⑥ 茅盾：《莎士比亚与〈哈孟雷特〉》，《茅盾全集》第30卷，第308—309页。

⑦ 茅盾：《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茅盾全集》第33卷，第468—469页。

我们从茅盾文章中摘引出上述观点，特别是有关人性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解读过茅盾的莎评。鲁迅曾痛批梁实秋的人性论观点，因为人性论观点与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相冲突，如果人性真如梁实秋所说是永久不变的，那么对国民性的改造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茅盾与鲁迅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和配合达到了相当默契的程度，对包括人性等问题的看法都保持一致。因此，以我们过去的看法，茅盾不大可能认同人性话题。然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茅盾不可能不为莎士比亚对人性触目惊心的描写和揭示所触动，他不仅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了旧的贵族文化和新的商业资产者文化的冲突”，^①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而且看到了莎士比亚因对人性的描写所具有的跨越作者时代的普遍性与永恒性。但人性问题的敏感性使他或多或少显示了一种内心矛盾：既想表达莎士比亚人性描写的价值和意义，又极为谨慎地试图调和人性与现实性两者的关系，于是出现其文中人性与现实性杂糅在一起的微妙表述。最终，茅盾的现实政治需要抑制了文学的内在学理探究与考量，现实主义的接受自然取代了浪漫主义和人性等其他视角的接受。

茅盾对莎士比亚前后判然有别的两种态度以及接受中的价值取向，都鲜明地烙上了社会政治功用性的印记。作为“文学研究会”、“左联”的重要成员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坛领袖之一，茅盾对人生、社会、政治有一种自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早在1919年，茅盾在《我们为什么读书》一文中宣称：“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求学问是欲尽‘人’的责分去谋人类的共同幸福。”^②1920年他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更明确指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③因此茅盾认为，文学家的责任就是让“文学成为社会化”。^④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表述从艺术哲学的高度看，是将所谓的“人”与“人生”作了相对狭隘的理解，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不过，这在特定时代又往往有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民族本位的启蒙，亦即爱国前提下的人的解放。^⑤

茅盾从社会政治层面接受莎士比亚，充分表现了他关注现实的救世情怀。正因此，包含着太多社会政治诉求的茅盾莎评，在中国莎评史上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意义。第一，通过译介的方式将莎士比亚定位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主要不是具体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是试图从宏观角度为中国接受与传播莎士比亚找到一个最佳的、最具诱惑力的理由。第二，揭示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不朽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介绍苏联观点，尤其是通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来扩大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影响，提升其伟大地位，从而为当时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学习的光辉榜样，以促使文学更有益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当然，我们透过茅盾前后不同的莎评基调，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在现代中国命运的变化与转折。

综上所述，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已然成为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一个决定性的价值标准和主流倾向。这一价值标准和主流倾向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让饱经忧患且久受“文以载道”思想传统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赋予了文学以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五四”前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救亡图存、变革社会的历史语境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译介过来的众多文学思潮中独领风骚，当时的文学创作、译介、研究等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政治功用性倾向，中国知识精英对现

① 茅盾：《莎士比亚与〈哈孟雷特〉》，《茅盾全集》第30卷，第308页。

② 茅盾：《我们为什么读书》，《茅盾全集》第14卷，第52页。

③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④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选集》第5卷，第5页。

⑤ 李继凯：《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和推崇，多自觉地与社会政治使命紧密相连。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或许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呼吁文学对世道人心和群治的影响力量与载道功能的最强音。他在文中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 弃医从文的鲁迅同样是引领时代主流倾向的典型代表。他曾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② 于是他“当然要推文艺”成为“我们的第一要著”，以便完成改变国民精神的任务。^③ 这也是他将他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呐喊》的原因。

正是基于此，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这一价值标准和主流倾向不仅左右了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而且成为近现代中国接受其他主要外来作家的共同规律。易卜生、雨果、托尔斯泰等大作家在 20 世纪初能迅速被接受，广为人知，无一不是这个规律作用的结果。这些作家作品中强烈的批判精神、旨在疗救的人道主义情怀等思想内涵，都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提供了引以为用的政治资源，大助于国民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开展。例如，针对易卜生，胡适就说：“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④ 茅盾也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⑤ 梁启超、鲁迅、胡适和茅盾等人的主张，都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迫切的社会政治需求作为首要需求对外来文学的接受所起到的指引作用。

历史地看，这种指引无疑是正确的，无可厚非。赋予文学以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使命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特别是当社会处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时候，这种政治诉求就显得更为强烈、更为直接。这种情况并不独独发生在中国。众所周知，处于历史重要转折关头的 18 世纪欧洲启蒙文学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以唤起民众推翻封建专制。它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启蒙运动直接影响的结果。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既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又是启蒙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从创作到批评都引领了那个伟大的启蒙时代。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充分体现了文学对社会变革发展与政治文明建设进程积极干预和推动的存在价值。

当然，辩证地看，过于使文学服从现实，完全服务于现实需要，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与艺术魅力自然会受到损伤，势必造成对文学认识上的某种偏差，从而限制、妨碍人们对文学本质的全面认知，不利于开放与多元研究空间的自由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削”文学丰富性之“足”，来“适”现实需要之“履”，局限之处显而易见。受特定历史环境制约，过去我们多是从政治和现实角度来接受莎士比亚，使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在传播与影响方面远不及社会政治诉求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1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④ 胡适：《通信·论译戏剧》，《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⑤ 沈雁冰：《谭谭〈傀儡之家〉》，《文学周报》第176期，1925年6月7日，第38页。

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致使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以外其他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受到遮蔽。梁实秋莎评曾长期得不到重视,除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还在于和当时的社会需要与主流价值取向不合拍。不过,从对莎士比亚价值的丰富性、多元性探讨而言,梁实秋莎评值得肯定。梁实秋坚持学术探究,自觉地从剧本本身出发探寻其初始意义,进而进行人性阐释,既看到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一面,又重视其浪漫主义的特质,对莎士比亚的伟大给予充分认知,又毫不讳言他的瑕疵。他力求客观探寻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价值与艺术魅力,表现出了可贵的学术品格。他的人性论观点以及反对把文学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态度,虽然不适合那个特殊时代,却使他的莎士比亚接受呈现出更多的学术意义。他的莎评是中国莎评史上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在中国莎士比亚评论的初期,在学术学理探究方面具有引导、启蒙的意义,同样推动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关注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他的莎士比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且通过他的研究可以展示莎士比亚在20世纪上半叶一个中国学者那里的存在状态,一种不同于现实政治功用接受的命运礼遇,也可以启示我们保持开放心态,使文学接受在多元化视角下,获得更加稳健有序而又多姿多彩的发展。

三、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意义

检视近现代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对于提升我们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意识,培养我们跨文化接受的成熟心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首先,“价值与意义一样,都不内在于事物本身。只有靠我们的信念的强度,靠在通过行动征服或维护这些事物时所投注的热切程度,这些事物才获得价值与意义。”^①任何接受者在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时,总是根据现实需要和自我需要去挖掘那些被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我们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原则。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我们前面提到的梁启超、鲁迅、茅盾等人是这样做的,还有不少人也能自觉坚持这一点。例如,1942年1月,张天翼在《文艺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谈哈姆雷特》认为,哈姆雷特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现代精神”,其核心是“怀疑和否定”,现代中国需要用这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去反对独断主义。同年12月,导演《哈姆雷特》的焦菊隐从不同角度阐释哈姆雷特的现实政治意义,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犹疑不决,始终不把所看清的表现在行动上”的人,这“对于生活在抗战中的我们,是一面镜子,一个教训”,他的悲剧告诉我们:“抗战的胜利系于全国人们的和谐的行动,更系于毫不犹豫地马上去行动。”^②显然,无论前者赞扬哈姆雷特的“怀疑和否定”精神,还是后者批判哈姆雷特的“犹疑不决”的性格,都是基于反蒋和抗战的现实政治的目的。所以,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接受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莎士比亚由传奇作家到争议人物再到现实主义大师,可以说,在一次又一次的阐释与争鸣中,莎士比亚由表面走向内在,由疑问走向神圣,由通俗走向经典,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作家的创作带来了积极影响,而且也间接地对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在此重申吸收外来文化文学为我所用的原则,也是针对弥漫在当下缺乏严肃思想和价值引导的接受倾向。在消费文化盛行、喧嚣炒作普遍、价值迷失、思想缺席的语境里,学界对外来文学批评理论和作家作品的接受缺乏必要的碰撞和争鸣,显得沉闷拘谨,没有活力。多元开放的时代不仅需要

①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② 参见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第242页。

百花齐放，更需要百家争鸣。争鸣是观点的对峙，碰撞是思想的交锋。价值和意蕴总是在接受者不断的碰撞与争鸣中逐渐得以敞开和确立的。任何共识和真理的达成，都是碰撞争鸣的结果。我们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史实看，接受中充满了激烈的碰撞和争鸣，这种接受的曲折性和争鸣碰撞的激烈性，是当时其他众多外来作家难以比拟的，这构成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接受的独特性。这种曲折的突出性与碰撞的激烈程度，充分彰显了接受者对所关注对象价值与意蕴的诉求，说明接受者绝不盲从的积极主动立场。因此，强调价值坚守，增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责任意识，对健康的当代文化建设和跨文化接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莎士比亚这一典型接受个案说明，一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与接受普遍存在一个共同规律，即变异现象。这种变异现象与本土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现实语境、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密不可分。因为异质文学之间的交流和接受从来都不是在一对一的完全吻合状态下进行的，而是接受者基于内在需求的驱动，并在本土文化、现实语境与自身审美趣味等引导下对异质作家作品进行的主动选择、改造、移植和扬弃。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作家作品常常会在异质文化中出现与其原质原貌错位或者有所不同的现象。这就是文化过滤。“接受本身就是批评。每一次接受，接受者都有意无意地作了选择，而文化框架在文学接受中默默起着过滤作用。”^① 因此，导致变异现象发生的文化过滤是异质文学之间接受与交流过程中的必然规律。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接受历程，正是这一必然规律的生动反映。

其次，莎士比亚是一位从不在某种理念的规定下进行创作的杰出作家，他以博大的胸襟、天才的想象展示了一系列生动鲜活、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渗透了他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极富张力的作家。一千个读者心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造就了莎士比亚的说不尽，他作品中包括思想性、现实性、宗教性、艺术性等方面的内涵，这种丰富性更是决定了接受者对他的接受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次穷尽，而是需要反复地、持续地、多元化视角地去发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西方世界历经近四百年的批评和接受后依然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正如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人物赫尔德所说，莎士比亚是一个自然与人生的伟大创造者，他的戏剧里激荡着自然与历史的汹涌澎湃的大海，“这里不是诗人！是造物主！是世界历史！”^② 雨果也盛赞莎士比亚：“丰富、有力、繁茂，是丰满的乳房、泡沫满溢的酒杯、盛满了的酒桶、充沛的汁液、汹涌的岩浆、成簇的萌芽、普赐生命的甘露，他的一切都以千计、以百万计，毫不吞吞吐吐，毫不牵强凑合，毫不吝啬，像创造主那样坦然自若而又挥霍无度。”^③ 他“好像原始森林”，又“好像滔滔的大海”。^④ 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接受经历显示，不同的接受者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见仁见智，同一个接受者，在不同时期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差异。这让我们看到，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接受者反复地咀嚼和体会。如果将一个接受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接受对象的批评观点，放在贯通的整体视野下去审视，就有可能发现某些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性。接受主体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下的意图选择所显示出的价值倾向，必然使理解具有某种鲜明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天然地带着有限性特征。这是接受本身体现出来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明白了接受中客观存在的阶段性与有限性认知特点，就会冷静地对待接受外来作家作品过程中产生的曲折性与矛盾性，并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

① 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 赫尔德：《莎士比亚》，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76页。

③ 雨果：《莎士比亚论》，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第416页。

④ 雨果：《莎士比亚论》，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第421页。

理性态度，表现出应有的长远开放的眼光和宽容豁达的胸怀。

再次，梳理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接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并恰当地处理好现实政治功用与学术学理探究的关系问题。“从功利和道德的观点看待文学，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就总是提出唯一的解释和唯一的标准。承认阐释自由使我们能够摆脱这种狭隘观念，充分认识到鉴赏和批评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地，那儿艳丽缤纷的色彩都各有价值和理由”。^① 文学研究探讨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质的规定性，探讨那些能引起历代读者共鸣和吸引力的具有超时空普遍意义的因素，更多的是审美范畴的研究。但学术研究者毕竟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现实的责任和文明的理想使他希望通过作品思想的揭示，发挥作品的政治思想教育功能，影响读者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从而间接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需要文学的政治意义的研究，也需要文学的艺术魅力的探究。政治功用与学术探究是一种既不能相互取代又彼此渗透互补的关系。政治追求现实，坚持方向，原则性强；学术研究注重学理探究，倡导精神独立自由，视野广阔没有禁区，但两者都实事求是，追求价值。“让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沟通能够建设性地进行，从而达到‘价值探讨’的典型意义”，^② 是我们从事研究的理想目标。过去，我们的文学批评总是在两个极端上徘徊，试图寻找合适定位而又飘忽不定。我们曾经使社会历史批评定于一尊，其极端做法致使文学批评变成了庸俗的阶级分析和政治批评，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受到了轻视甚至损害。前面我们已引述过的茅盾对“莎士比亚化”的介绍，从一个侧面看，就有过于现实政治化解读的倾向，他认为“莎士比亚化”就是“要升到现代思想的顶点，彻底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文化，以及马克司（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列宁，斯太林（斯大林）的学说”，就是“以艺术为武器”，“做自己阶级的勇敢的战士”等。这种解读因过于受苏联影响而导致政治化的认识倾向，事实上遮蔽了“莎士比亚化”丰富的学术内涵，把本来是学术的莎士比亚研究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我们更应铭记20世纪50—60年代把反右派政治斗争和莎士比亚研究联系起来，给中国莎学专家带来巨大灾难的那段惨痛历史。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入和运用，我们的文学接受又出现了用张扬文学独立价值来消解社会历史批评的倾向，颠覆其原有的合理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批评中精神与道德的缺失，使得原本合理需要的审美性变成了失根的片面追求。这是文学批评不成熟的表现。可见，学术学理探究与现实政治功用的关系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者永远都要面对并需要不断探索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之，经过历史的曲折迂回和中国莎评家长期不倦的辛勤努力，无论在现实政治功用层面还是学术学理探究层面，我们对莎士比亚的价值和意义都已经有了更为深刻、多元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国莎学者开始走向世界，让国际莎学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们应该继续开放视野，关注并吸纳国外莎学新成果，积极开创21世纪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何兰芳 责任编辑：王兆胜〕

① 张隆溪：《诗无达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79页。

②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47页。

Questions): How can man think what he does not think? How can man be that life? How can he be that labor? How can he be the subject of a language? Apart from this, Foucault also discussed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another important question of Kant's: What is Enlightenment? According to him, Kant's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which he came up with the "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 In sum, Foucault's Questions derived from Kant's Questions, and his "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 is an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Kant's anthropology.

(8)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cholar-Gentry's Literary Schools and Literary Change in Modern China *Liu Kedi* • 135 •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styl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saw great changes in the way the tradition of the scholar-gentry's literary schools was handed down. A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however, these schools still played a role in literary change in modern China. Some of the literati were even obliged to reframe their literary concept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ir school. The particular influence of foreign teachers on the literati in the modern period deserves atten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forms of these schools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analy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ry change and the way these schools were handed down, and, employing materials such as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the literati, examines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the everyday interactions of representative literati groups. It reveals another account of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underlying the publicly published version. Research on modern literature may lack completeness and objectivity unless it sorts through and studies the relevant views and comments in these private material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of studying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schools is that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flower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specially the healthy progress of different literary schools, and finally contribute to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both moral and academic tradition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of literature.

(9) A Tortuous Process: Shakespeare's Reception in Modern China *Li Weifang* • 150 •

Modern China has witnessed a tortuous process in relation to the reception of Shakespeare, a situation that has no parallel among the multitude of other foreign writer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ut is unique to Shakespeare.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 socio-political appeals and academic explorations have revealed the modes, values and meanings of the Chinese reception of Shakespeare,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mind of the recipients. Constrained and influenced by a given historical context, the dominance of Shakespeare's socio-political appeal meant that the realist values and meanings of his works were given full play, while academic research on Shakespeare was relatively weak. Objective assessment and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is period of literary history with the aim of grasping the inner laws of the Chinese reception of Shakespeare will not only give us more rational self-awareness in trans-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but will also provide us with important lessons, reference material and stimulus for affirming the values,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